

中国共产党与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

李东朗

[摘要] 中国在经历了近6年的漫长时间后,才对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日本实施全面战争。其缘故,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误国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力主实施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为此尽其所能地做了一系列工作,发展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后来实现全国抗日打下了一定基础。1935年中共发布《八一宣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引领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方向,促成了和地方实力派合作抗日的关系,推动处在动摇状态的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破产后转向抗日,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国抗战的形成。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国抗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538(2025)04-0032-15

抗日战争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列强侵略带来的民族耻辱,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意义巨大而深远。抗日战争又是艰苦卓绝的,艰苦卓绝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发动,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为推进和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在非常艰险的环境中和困难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多措并举,引领和不断推动全国走向抗战。中国共产党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其抗日战争中流砥柱作用的重大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

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之所以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掌握全国政权和全国资源的国民党的反动、错误政策。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按照国际常规和一般应对惯例,一定要给予坚决的自卫和反击。

但是,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举世罕见的抵抗主义。结果日军轻易侵占了东北三省,制造了一个“满洲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蒋介石之所以对日本的侵略不抵抗,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忌惮日本实力。1932年1月12日

[收稿日期] 2025-07-01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重点项目“国共两党和抗日战争”。

[作者简介] 李东朗,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九一八事变近4个月后),他就此解释说,“中国国防力薄弱”,若抵抗会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1]。1934年7月,他在国民党军官训练团讲话中再次说,日本侵略中国,“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2]。他对中国抗日前景很悲观:“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3]直至1938年,他仍反复解释:“在九一八的时候,决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4]这种惧怕日本实力的心理,长期支配了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二是为了集中力量大规模“剿共”,镇压革命。这是蒋介石在日本侵略面前不抵抗、屡屡退让的根本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明确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他处理政务的基本方针,公开宣称:“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5]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更是重申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6]一二八事变当日,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明令:“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7]直至1933年,他仍向所属将领宣示:“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8]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理论上讲,“攘外必先安内”具有合理性,“攘外”必须内部团结统一,以便集中对外,否则难以“攘外”,即“安内”是“攘外”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

障。但“安内”是有条件的,当政者必须秉权为公,施政能够代表内部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共同利益,赢得普遍的认同和支持,否则内部矛盾尖锐、思想混乱,难以安稳。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攘外必先安内”,无疑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内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的革命并且屠杀革命同盟者——共产党而引起的。中国共产党的反抗是要继续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简言之,内战是国民党背叛革命、倒行逆施的结果,是其政治反动的恶果。就此,宋庆龄在当时就指出,“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9]。著名学者陶行知分析说,“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10]，“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11]。胡适也认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历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齐寇兵,资盗粮’造成的”^[12]。因此,蒋介石如果要“安内”,理应改弦更张,修正错误,而不是武力压迫,暴力是难以“安内”的。历史地看,在日本大规模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之时,抗日是国家、人民的最大利益,“攘外”恰是聚拢人心的“安内”的基本条件。

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后的中国时局陷入一个严重危机循环演进的危险境况:日本的侵略越来越猖狂,继侵占东北后不断向华北深入和扩大;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战争的幅度越来越大,屡屡接受日军的侵略要求,屡屡地丧权辱国,中华民族的危难一步步加深。

1932年初,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虽有十九路军和增援的第五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下奋起抗击,但最终国民党仍与日本签订了规定中国取缔抗日、十九路军换防、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等内容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1月,日军借口中国军队向山海关日本

宪兵队门前投掷手榴弹,进攻和侵占了山海关。

2月23日,日军以有日本军官在热河境内失踪为由向热河进犯。国民党当局高调表示“抵抗”^①,但实际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结果日军不到10天就攻陷了热河省。

同年3月,日本侵略军向长城沿线进攻,结果以国民党当局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而告终。该协定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规定“长城以南”即察北、冀东22县中国军队不得驻防,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名存实亡。甚至有国民党CC系背景的《时代公论》周刊也认为,该“协定签字之日,即华北三省丧亡之时”^[13]。

1933年秋冬,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党当局和日本就关内和日本占领的东北达成通车、通邮、通商和长城设卡收税等协定,实际上再次表示了对伪满洲国的承认。

1935年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国民党在日军的威胁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对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平、津、河北。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华北实已等于灭亡”^[14],是“奇耻大辱”^[15]。

1935年12月,国民党迁就日方要求,成立日本和汉奸势力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发动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继而又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围剿”陕甘苏区,大打内战;严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逮捕要求抗日的救国会“七君子”。

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错误做法,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加剧了民族危机,特别是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这是中国未能在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实现全国抗战的主要原因。

二

其时,中国共产党虽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和白色恐怖的镇压中,处境非常严峻,但仍秉持建党伊始就确定的反帝初心和使命,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明确提出反对日本侵略的主张。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别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16];谴责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帝国主义压迫的战争”^[17]。22日,中共中央作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决议,部署全党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1932年4月15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战争!”^[18]。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抗日立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和任何对日本侵略退让妥协的做法。

为了推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坚决抗日、挽救民族危难的举措。

第一,反复、强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发表抗日宣言。1931年9月30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其后,针对日本的侵略,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吁。如在1932年:1月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1月27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前一天)发

^①蒋介石认为此“与既定方针不合”,在日记中写道:“欲促汉卿(张学良)赴热河支持战局,非由余北上不可。对内对外,似皆不能无此行,但与既定方针不合,然去而即回,当无妨也。”参见陈红民:《从〈蒋介石日记〉看其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

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淞沪抗战爆发后,1月31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3月24日,发表反对英美使节与国民党当局酝酿设立上海“中立区”的《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书》;4月5日,针对《淞沪停战协定》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5月9日,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又如,在1933年:1月7日发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3月3日发布《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5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再如1935年,针对华北事变,中共中央于6月15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于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在国民党与日本秘密交涉、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上,中共中央无一例外地发表抗日宣言,强烈号召全国民众奋起,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径。

第二,部署全党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19]。并特别强调“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这些工作^[20]。1932年1月,中共中央针对日军即将进攻上海的严峻形势,指示:“党应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21]1932年8月30日,针对日军在山海关、热河的不断挑衅,中共中央指示全党:“最迅速敏捷的动员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以无产阶级的抵抗与回答。”^[22]

指示河北省委“最迅速的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十倍的开展反帝反日的群众工作”^[23]。1933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中,指示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去动员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的反帝斗争,组织吸引并提高他们到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中去。”^[24]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的问题》的党内紧急通知,指出:“目前时局的严重须要我们党切实的经过这些艰苦的工作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从目前的危机与陷阱中找出革命的出路!”^[25]。8月1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九一八”二周年的决定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以战斗的动员来进行”抗日斗争,“进行一切反日的组织与斗争”^[26]，“必须加紧开展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的战争”^[27]。1934年4月,针对日本侵略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发出的紧急通知中再次要求,“各级党部必须不失去一分钟的时机,战斗的动员起来”,开展各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工作^[28]。1935年“河北事件”发生后,中共临时中央局要求各地党组织“抓紧华北这次严重事变,号召与组织全国人民通电抗议与罢工、罢课、罢市示威以至武装斗争”^[29]。

第三,开创东北大规模抗日的局面。

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明确指示身处抗日斗争第一线的东北党组织,“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30]。并为此专门作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要求满洲省委“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31]。

中共满洲省委随即领导东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掀起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组建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斗争,到1933年初,由党直接领导的磐石、海龙、巴彦、汤原、珠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在斗争中,抗日武装部队得到了发展,先后改组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反日军等。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①,形成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个大游击区,并建立了20余块游击根据地。东北抗联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支柱,给予日本侵略非常沉重的打击。据“满铁”统计,1934年3月到10月,所属各线被袭击534次,铁道被破坏101处。抗日武装出动数,1935年为3.91万次,累计人数178.38万人次;1936年为3.65万次,累计人数135.55万人次^[32]。日本陆军省1936年3月18日公布: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末,关东军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到1937年9月的6年来,关东军在东北死伤达到17.82万人^[33]。日本侵略军为之痛恨不已,称东北抗联为“满洲治安之癌”^[34]。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条件下唯一能够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是党突破困难、坚决把抗日主张付诸实施的硕果。它在全国人民面前高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为局部抗战和后来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许多城市迅猛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中共党组织积极参加和组织了这些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最高峰。在1931年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中,中共北平市委成立

了由刘德承(后改为林里夫)、李续刚、林枫、陈沂、薛迅组成的5人秘密党团参与领导,林枫任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党团成员,陈沂担任示威团的纠察队长,千家驹起草了南下示威宣言。在南京的示威活动中,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举行“党团会议,指定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和秘密指挥及纠察队”^[35]。再如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领导核心中,有中共党员岳增瑜、赵作霖、邹科嵩、扈文章四人,岳增瑜任总指挥,另有党员张百川、千家驹等。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因此在当时评论说,学生运动中,“以共产党的活动最猛烈”^[36]。

南京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场地,中共党员汪楚宝担任南京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中央大学接待各地的学生请愿团和示威团,并以该校为核心,组织南京学生及全国赴南京学生一次又一次开展斗争,中央大学的地下支部在这中间起了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杨晋豪、王枫、狄幽青(即获超白)等都是中大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力量。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员许邦和、乔魁贤等在运动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共青团员、北大法学院学生李时雨是12月14日全国学生大示威的总指挥,共产党员、南开中学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张敬载是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学生代表。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影响远播的一二九运动,是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由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和指挥的。悲愤喊出爱国学生共同心声的《告全国民众书》也是由共产党员蒋南翔起草的。它把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得到社会普遍同情和广泛响应,由此形成遍及全国大中城市甚至部分农村、规模空前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毛泽东高度评价它的作用:其直接意

^①关于东北抗日联军总兵力,普遍表述为鼎盛时期达到3万多人。王惠宇的研究判断:根据《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相关原始档案文献,并结合回忆史料、日伪资料,对这一时期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的部队构成和人数变化情况进行重新考察,1936年秋到1937年夏,东北抗日联军总人数最多时约为1.4—1.5万人。参见王惠宇:《关于1936—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人数的考察》,《长白学刊》2017年第6期。

义是推动抗日战争^[37]。

第五,大力支持和参与局部抗战。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共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共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一封信》《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向全党指出上海事变“完全是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目前上海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很明显的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党的任务“是积极的加入这一战争”^[38]。据此,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组织策动各界人民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具体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抗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联络十九路军和组织民众。据统计,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民反”义勇军和各地来沪义勇军总人数达5000人以上,他们编成救护、担架、运输、募捐、慰劳等队。救护队和担架队约有200多人到战区参加救护活动。运输队、施工队成为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的得力助手,凡十九路军有什么运输和施工任务,“民反”义勇军就及时组织力量去完成。“民反”义勇军还及时地向闸北前线运送粮食、蔬菜、食油以及枪支弹药。“民反”宣传队向各界民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募捐队到工厂、学校、平民村进行劳军募捐;组织青年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就此,指挥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受很深:“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39]与此同时,在时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等领导下,把沪西17家日资纱厂4万多工人为取消月赏而举行的罢工(经济目的)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政治斗争,并把这个反日大罢工坚持到停战之后。沪东区和闸北区要求抗日的失业工人,也先后汇集到沪西区参加反日斗争,

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认为蒋介石等不抵抗“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40],中共党组织积极推动他开展抗日工作。冯玉祥向中共党组织“正式提出要求,派干部一起和他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41],中共北方特科先后派出武止戈、张存实、许权中、张慕陶、吴化之、王霖、赵作霖等帮助他从事军事、政治工作。1933年3月,冯玉祥接受中共北方特科提出的《抗日盟军纲领草案》,明确双方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42]。在中共的推动和帮助下,5月26日,冯玉祥联络旧部和各种武装,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共派出300余名共产党员参加该军工作,宣侠父、张慕陶担任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许权中、武止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张慕陶担任同盟军总政治部主任,宣侠父还担任吉鸿昌第二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主力第五师师长。许权中是阮玄武第五军的十八师师长,武止戈任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吴化之任吉鸿昌部政治部主任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支应遼师的师政治部主任王沛南,3个团长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都是共产党员。古鸿昌部政治部副主任张存实,同盟军干部学校校长张克侠,以及孔原、谢子长、阎红彦、刘仁、王其梅、周仁山、孙大光等共产党人,均参加了同盟军的各方面工作。中共张家口特委“在冯的首脑部参与各种重要会议,在有关军事重大决策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43]。中共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共产党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加入了同盟军。

1936年8月,日本关东军驱使伪军——“蒙古自治军”进犯绥远。8月和10月,毛泽东分别两次致函傅作义。一是呼吁和激励傅奋起抗战:“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44]二是表示红军愿配合傅抗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45]。1936年11月绥远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

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敦促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再次表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抗日战线”^[46]。中共的支持对傅作义的绥远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傅作义由此把守在陕、绥边界用以对付红军的部队尽数东调，开赴于抗日第一线。

中共的上述实践，不仅对局部抗战是有力的支持，而且对推动全国抗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六，倡导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3年初，针对日军侵占东北、向关内侵略的严峻形势，中共发出“三个条件”之下合作抗日的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47]以后，中共反复宣示了这个主张，“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48]。

中共“三个条件”之下合作抗日的宣言，传递出停止内战、抗日第一的强烈意愿和对推进大规模抗日前景的期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即是集中的体现。所谓“任何武装部队”，显示出联合抗日的对象很宽，既包括国民党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和地方武装（民团等），也包括执行国民党“剿共”方针的中央军。应该说，中共的这“三个条件”非常宽容。“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这是联合抗日的基本条件，如果彼此继续互相进攻、继续战争，则联合抗日无从说起；“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既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目标，是中共发动民众抗日主张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实行抗日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基本条件；“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是实现抗日的具体而重要的内容。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共在日本侵略中国的严峻形势下，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内政策。虽然调整还是初步的，但意义重大，是朝着全民族抗战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

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各军队抛弃过去政见分歧、利益差异和敌对行动，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再次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49]《八一宣言》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主要内容：一是确定党的政治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并据此修改了与此不相适应、带有“左”倾错误的政策；二是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上层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了民族矛盾成为中国主要矛盾的形势，为推进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上述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条件下力所能及、尽其所能开展的抗日斗争，经历了许多曲折。其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斗争，在国民党对日妥协屈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开拓并不断拓展了抗日救亡的路径，其成果为后来全国抗日斗争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

《八一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瓦窑堡会议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两者结合发力，迅速产生巨大的社会冲击力，（在以往一系列工作积累的基础上）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形成中共引领抗日救亡运动的崭新局面。

第一，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受到普

遍欢迎和强烈支持。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在法国中共创办的《救国报》上发表,随即在中国迅速传播,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震撼,获得广泛的响应。以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连续发表宣言,响应中共号召,强烈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50],并表示要“以抗战救亡的决心,督促政府变更向来的妥协政策”^[51]。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界人士鲁迅公开申言,“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政策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52]。被国人尊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最近发表了一个宣言,作了一个决议,我看很对,我完全赞成。”^[53]一些许多过去对共产党不友好的人,也转而支持中共的主张。如李济深认为中共制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进行斗争,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我们民族的危亡”,他表示“很乐意同中共合作,通过统战关系进行反蒋抗日活动”^[54]。属于西山会议派的“邹海滨先生(即邹鲁—引者注)主张联俄,联共,武装抗日”^[55]。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东荪看到《八一宣言》后非常感慨,认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56]。他连续撰文宣介中共的抗日主张,称“全国教育界对于共产党的这个转向应得重视”^[57],并因此和中共建立联系,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华北各界的抗日活动。

第二,激发了一些党派团体的抗日积极性,形成对中共争取全国抗日努力的有力配合。第三党在其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和福建事变失败后处于涣散状态,而且以前并不认可中共进行的土地革命。中共《八一宣言》促使其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发生巨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主力,要革命就要联合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该党第一

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二干会议”)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不仅删除了过去政治纲领中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内容,而且确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现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58]。参与会议的郭翹然认为,这次会议“实质上就是以《八一宣言》为动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响应《八一宣言》的一次会议”^[59]。李济深、陈铭枢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公开接受《八一宣言》的主张,强调“联共为统一救国之关键”,“联共又为统一救国之枢纽”。“蒋介石政策之可憎,即在不顾亡国,进行内战。共产党新政策之可敬,即在亡国大祸之前,一切政策以抗日为中心,决与全国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共同救国”^[60]。因此,“我们相信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诚”,“我们要求联共联俄抗日救国”^[61]。救国会认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62]其成立大会的宣言和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于去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中国红军领袖也迭次发出通电,吁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63]同时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对内军事行动,“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64]。张君勱、张东荪等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素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但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1936年7月,该党二大提出全国立即进行抗日的主张。中国青年党在历史上是反共的,原先积极支持南京政府的反共内战,但在抗日问题上和中共渐行渐近:“主战是中国起死回生的救命汤,我们赶快实行对日作战!”^[65]其于全国抗战时期,在抗战、民主等方面对中共有颇多协助。

第三,促生了重要的抗日团体。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新高潮的

产物。救国会的主张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高度一致,其确定自身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66]。由于有鲜明的抗日立场,因此救国会组织迅速在全国发展,1936年底其会员达数十万人,成为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抗日党派。再如全国学生联合会。1929年,国民党当局勒令全国学生联合会停止活动。在一二九运动形成的抗日救亡高潮中,1936年5月29日,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重新组建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易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该联合会以“团结全国学生、促成全国统一战线、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67],积极活跃在抗日救国第一线。再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它是中共北京市委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其鲜明的抗日诉求和爱国主义特征,迅速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发展起来。“截至1936年底,‘民先’在国内三十多个城市和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68]。“当时全国已有‘民先’队员六千名”^[69]。全国抗战爆发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猛增到2万人,1938年发展到3万多人,成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和掀起全民族抗战的高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上述事实,彰显两点:一是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发挥了引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舆论的作用。特别是营造出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强烈诉求,形成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强力挤压,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于推动全国走向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立场和坚决推进抗日的努力,赢得抗日小党派和团体的认同,实际上增强了中共在中国抗日斗争中的话语权,提升了中共抗日主张对他们的影响力。许多社会人士和小党派由此向中共靠拢,中共与小党派的关系,或是由过去隔离、毫无关联发展为获得信任和认同的关系,或是由以往相互对立转化为建立接触与合作抗日的关系。这些都对促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过程。

四

中共推进全国走向抗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达成合作抗日。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大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大员转向抗日。

中共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工作,迅速取得成效。其具体过程,已有很多成果,在此不再详述。而张、杨之所以能够迅速与中共建立抗日联合关系,主因还是对中共坚决抗日和团结抗日主张的认同。对张学良产生思想震撼的,最早是《八一宣言》。他在上海杜重远处了解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后,产生了与红军联合抗日的想法,要求杜重远帮他与共产党联系。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对于家乡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军将士触动极大。张学良后来在台湾就此解释说,东北军三战三败,连损两师,“使良心中倍增痛苦”^[70]。而“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实动我心”^[71]。杨虎城亦然,中共真诚抗日的立场化解了他因四方面军进攻汉中的疑虑,遂与红军订立秘密抗日协议。从1936年4、5月份起,红军和东北军、17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逐步形成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合作抗日的关系,不仅打破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而且创造了中共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开展统一战线的便利。此前,中共和地方实力派基本没有联系,甚至和许多地方实力派处在直接敌对的状态。而张、杨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以及他们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系,间接助推了中共与各地方

实力派的关系。对于地方实力派来说,国难深重的时局、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严重矛盾,特别是中共坚决抗日的主张和抗衡蒋介石的实力,促使他们选择和中共建立联系。如桂系、刘湘、宋哲元等派代表到陕北与中共接洽,中共也相继派人与他们联系。

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长期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存在尖锐的矛盾。1936年6月,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是谓“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发表声明,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72]。随后,中共中央派云广英、张云逸,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派胡鄂公、宣侠父等人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和相关建议打动了李宗仁等桂系首脑,他们表示,“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完全赞成”,“希望今后抗日斗争我们相互配合”^[73]。双方就合作抗日达成共识。

其时,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因蒋介石使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其部队,而与蒋介石的矛盾加剧。中共中央派李一氓、罗世文入川对刘湘做争取工作,并转交了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中共中央上海局先后派吕一峰、黄子谷、张曙时、傅春吾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在南京、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和潘汉年、冯雪峰也对之做工作。最终刘湘接受了中共给他的团结广西李、白和云、贵地方实力派,发动民众爱国运动,和中共加强联系的建议,提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八字方针。1937年7月6日,中共代表张云逸在桂林与桂系、刘湘代表签订了《川、桂、红协定》^[74]。其主要精神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还打内战,就联合起来反蒋”^[75]。

对统领平津地区的29军军长宋哲元,中共三管齐下。毛泽东接见宋哲元的联络代表刘子青,回信宋哲元勉励其坚定抗日决心。“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表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誓竭尽全力以为后援”^[76]。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群众改变态度,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口号改变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第29军保卫华北”等,发动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对29军进行慰问、宣传活动。同时,“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77]。

为争取阎锡山联合抗日,毛泽东在东征回师后即致信阎锡山,表达愿与之建立抗日联合的意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曾先后派彭雪枫、南汉宸、王世英等赴太原与阎锡山联络。1936年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山西,接办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将其变成抗日进步团体,并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开办训练班、教导团,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武装群众,培养了一大批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由此形成了与阎锡山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日。

此外,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同甘肃的于学忠、新疆的盛世才、山东的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等直接间接地建立了联系。

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乃至合作抗日关系的建立,是推动形成全国抗日的重要步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作了重要的准备。

五

中共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初,是将蒋介石排除在外的。《八一宣言》称蒋介石是“卖国贼”,瓦窑堡会议决议将其说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因为蒋介石极力反共,屈从日本侵略、牺牲国家利益的缘故。但自1936年春天起,中共中央逐渐并大幅度调整了对蒋介石的政策。

关于中共中央调整对蒋介石的政策,不少著述关注到1936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与《红色中华》记者谈话中的一段话:“中华苏维埃政府

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直率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78]但上述报道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拟的^①,不是其时中共中央的态度。中共中央改变对蒋介石方针的时间,应是4月下旬。其缘由有三。

一是受宋子文委派到陕北与中共接触的董健吾、张子华,3月间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由此获悉了蒋介石要与中共接触的信息。周恩来4月9日对张学良所说的,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79],应是实情。

二是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的意见,推动了中共中央调整对蒋介石的政策。

三是在3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上,张闻天关于“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80]的表述,标志着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识的深化。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否决因蒋介石集兵“围剿”东征红军和扰乱陕甘苏区而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81],即是证明。

因此,中共中央4月25日发表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呼吁的“各党各派”中排在第一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前所未有的现象)。在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以“蒋氏”取代之之前对其卖国贼的称谓。并且申明东征回师的行动,是“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82]。其后,中共加紧了

争取蒋介石走向抗日的步伐。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83]。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明确提议国共重新合作,表示中国共产党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84]。

基于争取和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的认识,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85]至此,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的转变。此一转变的发展轨迹和逻辑结果就是“联蒋抗日”。这一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关键时刻的重大政策调整,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后,中共中央把争取蒋介石走向抗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点。1936年9月,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86]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87]1937年4月

^①参见王美芝:《〈毛泽东与王稼穡最近谈话〉出自谁手》,《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1935年10月11日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呼吁一致抗日通电》、15日发表的《朱德、周恩来等关于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致东北抗日联军及全国各武装力量各界人士的通电》,在致电对象中,都包括“南京蒋总司令中正”。(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109页。)这几封电报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的。

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重申“争取与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88]。

随即,中共大力做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一是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致函蒋介石,敦促其放弃反共立场,“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89]，“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90]。

二是加强各个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推动蒋介石转向。中共中央的认识非常明确,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91]。

三是对国民党的进攻采取必要的自卫还击,以打促和。针对蒋介石对苏区的“进剿”,1936年11月,红军在山城堡战斗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两个团。胡宗南受此打击,被迫停止了进犯。

四是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确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给国民党作出如下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四项保证是中共做出的重大的、“带原则性的让步”,这个让步,“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92]。“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93]。把四项保证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取消红军、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阶级斗争)^[94]相对照,可见中共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推动国民党转向合作抗日的重大作用,可见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重大牺牲和顾全民族利益大局的博大胸襟。

五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看到中共的

《八一宣言》,萌发了用政治途径解决共产党的想法,陈立夫、曾养甫等“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亦即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发动进行的”^[95]。邓文仪在莫斯科告诉王明:在看到王明相关统一战线的文章后,“蒋介石就更坚持要我立即到这里来同你们谈判”^[96]。但蒋介石的用意是“政治招降”。在“招降”过程中更施行军事“围剿”。1936年冬,他再次加紧部署“围剿”在陕北的主力红军。结果,逼得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蒋介石在被扣之初,“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估计中共“必以为千载一时之良机”,“必制我的死命”^[97]。后来他不仅了解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所为,“且其事变先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98],更体会到了中共在解决事变中不计旧仇、以德报怨的光明磊落。同时,西安事变标志着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完全破产。有鉴于此,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表示欢迎周恩来来南京谈判。西安事变在结束内战、推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过程中产生了关键作用,也标志着中共逼蒋抗日策略取得了成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日,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历经曲折和艰辛后,中共推动全国走向抗日的努力成为现实。

结语

毫无疑问,蒋介石走向抗日和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因素很多,但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作用非常突出。对此,日本中国事务评论家藤枝丈夫在当时所著的《新生支那与日本》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成为中国抗日运动的主潮流,而且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阶层抗日运动的地下实体指导者,从江西省红色政权的建立至跻居于西北边境地区,再到华北和华中地区抗日势力的扩大,已经成为领导中国抗日运动的核心力量。”^[99]

而综观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的工作,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并一以贯之地将其付诸行动,以自己积极救国救民的抗日言行影响、吸引和串连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人士,推动其向全国抗战的方向汇集。二是,中国共产党最先调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并为此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如果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则全国抗日不可能实

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做出四项保证的重大让步,国共合作抗战也难以形成。三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弱势地位上推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其间进行了艰苦的以小促大的努力,其政治能量之大、之强远非其他势力可比。凡此种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毅精神和顾全民族利益大局的博大胸襟。艰难推进全国抗日局面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机和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 [1][1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G].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317,688.
- [2][3]蒋介石.蒋总统集[G].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66,68.
- [4]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146.
- [5][7]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G].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29,34.
- [6]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482.
- [8]转引自刘庭华.中国局部抗战史略[M].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03.
- [9]宋庆龄选集:上卷[G].人民出版社,1992:83.
- [10]陶行知.“剿匪”与“造匪”[N].申报,1932-06-30.
- [11]陶行知.三论“剿匪”与“造匪”[N].申报,1932-07-04.
- [12]欧阳哲生.丁文江文集:第1卷[G].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279.
- [13]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M].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217.
- [15]转引自薛念文.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J].社会科学,2008(10).
- [16][17][19][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96,398,422,421.
- [18][21][22][23][3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9,90,565,567,114.
- [24]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G].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06.
- [25][26][27][47][4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00,287,288,458,470.
- [28][2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7,510.
- [30][31]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中共辽宁省地方党史编委办公室.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G].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中共辽宁省地方党史编委办公室,1962:78,81.
- [32]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满洲国警察史[M].长春人民印刷厂,1990:530.
- [3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东北抗日联军[M].白山出版社,2011:212.
- [34]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M].解放军出版社,2015:384.
- [35]林里夫.我在北平工作两年[J].北京市党史资料通讯,1983(11).
- [36]转引自周斌.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J].安徽史学,2020(06).
- [37]毛泽东文集:第2卷[G].人民出版社,1993:251.
- [39]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11.
- [40]张篷舟.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1卷[G].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99.

- [41][42]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G].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7,10.
- [4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第18辑[G].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240.
- [44][45][76][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G].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7,37,35,60.
- [46][84]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G].档案出版社,1985:311,235.
- [49][85][8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2,89,93.
- [50]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J].大众生活(1)(9),1936-01-11.
- [51]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J].大众生活(1)(14),1936-02-15.
- [52]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第6卷[G].花城出版社,2021:303.
- [53]人民出版社.宋庆龄纪念集[G].人民出版社,1982:123.
- [54]张忆军.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M].学林出版社,2001:185.
- [55]陈铭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N].救国时报,1936-07-25.
- [56]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J].自由评论,1936(10).
- [57]张东荪.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J].再生(3)(10,11).
- [58]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M].华文出版社,1996:91.
- [5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G].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7.
- [60][61]转引自袁旭,党德信.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上[M].燕山出版社,2007:113,114.
- [62]本社.沈钧儒纪念集[G].三联书店,1984:117.
- [63][64]沈钧儒文集[G].群言出版社,2014:157,153.
- [65]郑大华,俞祖华.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3卷(上)[M].人民出版社,2023:30.
- [66]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料集[G].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00,101,104.
- [67]胡献忠.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M].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170.
- [68][69]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M].北京出版社,2008:75,85.
- [70][71]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4,66.
- [7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42.
- [7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资料:第10期[G].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6.
- [74]曹蓉.“川、桂、红协定”及其来龙去脉[J].文史杂志,1996(6).
- [7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西南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黔西南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西南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136.
- [77]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G].人民出版社,1981:249.
-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7卷[G].中华书局,2011:5066.
-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修订本)[G].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04.
- [80]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G].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09.
- [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32.
- [82][83][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6,150-153,277.
-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6.
- [89][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G].人民出版社,1997:511,510.
-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54.
- [93]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G].档案出版社,389-391.

- [9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G].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435.
- [9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82,289.
- [9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G].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83.
- [97][98]蒋介石,宋美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 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G].台北正中书局,1986:92,92.
- [99]转引自武向平.日方档案佐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N].光明日报,2025-06-18.

(责任编辑 于朝霞)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Launching of the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i Donglang

Abstract: It took China nearly six years before it was able to respond with nationwide resistance to the Japanese full-scale aggression. The reason for this was the reactionary and misguided policy adopted by the Kuomintang with the leading of Chiang Kai-shek.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CPC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resolutely resisting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strongly advoc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id its best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work for this purpose, which developed the resistance Japanese aggression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laid down a certain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wide resistance later on. In 1935, the CPC issued the August 1st Declaration and formulated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olicy, which guided the direction of the national anti-Japanese salvation movement, facilit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with local powerful forces i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pushed Chiang Kai-shek, who was in a wavering state, to turn to resistant Japanese aggress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policy of “only by putting internal pacification before resistance to foreign invasion”,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